



收到哈佛的入学通知后,我去了趟肯尼亚

热点关注



奥巴马·奥巴马 著
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巴拉克·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,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。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,他的魅力来自何处,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,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。

[上期回顾]

同父异母的姐姐奥玛来美国看我。我带她去了我的办公室,还给她讲了我曾经和一个白人女孩谈恋爱的事情。奥玛也向我讲述了她在肯尼亚以及德国的生活。我们谈到了父亲和祖父,从奥玛口中,我觉得自己似乎正在越来越了解父亲。奥玛离开的时候,提出要回肯尼亚看看。

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通知书

感恩节的前一天,哈罗德·华盛顿死了。

没有任何预兆。就在几个月之前,哈罗德赢得了选举,轻易地打败弗尔多雅克和伯恩,打破了这个城市过去四年来一直维持的僵局。他这次选举更谨慎,处理得非常专业,没有1983年的狂热;是一次阵营巩固、预算均衡以及公众合力的竞选活动。他与一些旧机器时代的政治家们、爱尔兰人以及波兰人握手,准备讲和。企业界为他送来他们的支票,认可他的出现。因此他的力量是无忧的,然而,最终在他自己的阵营中出现了不满,黑人民族主义者,对他愿意与白人和西班牙人合作感到失望;行动主义分子,对他无法正面解决贫穷感到失望,还有那些宁愿做梦也不愿接受实际的人,无力妥协的人也对他感到失望。

哈罗德并没有太在意这些批评。他认为没有理由冒任何大风险,也没有理由急躁。他说,接下来的二十年,他还会继续当市长。

然后是死亡:猝然、简单、决定性的死亡,超重导致了心脏负荷过大,这个死因甚至因其平常而显得可笑。

那个周末下雨了,天气寒冷,雨不断下着。在社区里,街道上静悄悄的。在室内和户外,人们哭泣着。黑人电台重播着哈罗德的演讲,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,声声召唤着死者。在市政厅,人们排着队来瞻仰遗体,来哀悼的人可以环绕好几个街区。每一处的黑人都看起来茫然悲恸,不清楚方向,对未来感到恐惧。到下葬的时候,华盛顿的效

忠者们已经从最初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了。他们开始开会,重新组织,设法作出一种继续控制策略,设法选举哈罗德合法的继承人。但是太迟了。没有合适的政治组织,没有明确的原则可以遵守。整个黑人政治都围绕着一个个人运转,那个人像太阳一样发出辐射光线。现在由于他已经离开了,人们无法对现状究竟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。

效忠者们开始争吵,内江出现,谣言四起。星期一,那天市议会将要选举一名新市长,直到举行特殊的选举,首次将哈罗德推上台的联合几乎已经消失了。那天晚上,我去市政厅观看这第二轮“死亡”。人们,大部分是黑人,从傍晚开始,就聚集在市议会的议事厅外——老人、好奇的探求者、举着横幅和标语的男人和女人。他们大声叫骂着那位与白人集团合作的黑人市议员。他们朝那个善于言辞的黑人市议员挥舞着美元,他得到了白人市议员的支持,在机器时代后仍然继续任。他们称呼这个人是一个叛徒,是一位汤姆叔叔。他们反复喊着,踏着脚,宣誓永远不离开。

但是权力极富耐性,知道它要什么;权力比口号、希望以及点着烛光的守夜更有耐心。午夜左右,就在议会投票之前,议事厅的门短暂地开了,一会儿我看见两个市议员一起离开了。一个是黑人,曾经是哈罗德的人;另一个是白人,弗尔多雅克的人。他们低声说着话,短暂地笑了笑,然后看着外面还在反复高喊的人群,迅速地抑制住他们的笑容,他们穿着双排扣大衣,十分高壮,眼睛里流露出同样的渴望——他们是了解真相的人。

时间慢得让人窒息,几个月过去了,我不断地被暗示所有的

事情都还未完成。

二月,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入学通知。那封信带来一包厚厚的信息,让我想起了十四年前的夏天我从普纳后收到的包裹。

我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

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,我飞离了希思罗机场。一群穿着过火运动上衣的年轻英国男人坐满了后机舱,其中一个脸色苍白、满脸粉刺、身材瘦长的年轻人,坐到了我旁边。他非常认真地读了两遍紧急逃生手册,我们离开地面的时候,他扭过头来问我我要去哪里。我告诉他,我要去内罗毕拜访我的家人。

“我听说,内罗毕是个美丽的地方。我要去约翰内斯堡,但我想中途在那里停留一天也不错。”他解释道,作为地质学学位项目的一部分,英国政府安排他和他的同学去南非的矿业公司工作一年。“好像那里缺乏经过专门训练的人,所以如果我们幸运的话,他们会同意终身雇用我们。我想,这是我们获得一份丰厚薪水的最好机会,除非你愿意冻死在那些该死的北海石油钻井塔中。拜托,我不要。”

我提到,如果有机会的话,许多南非黑人也许会愿意参加这样的训练。

“好吧,我想,你的看法是对的,”他说道,“我不太赞同那里的种族政策,那是一种耻辱。”他考虑了一会儿,但是现在非洲其他地方正四分五裂,不是吗?至少据我了解是这样。不像那些凄惨国家的人们,南非的黑人没有遇上饥荒。不要羡慕他们,自管自吧,但是比起一些埃塞俄比亚的可怜乞丐——

一位空姐拿着供出租的耳

机,沿着走廊走过来,那个年轻人拿出他的钱包。“所以,我试着不理睬政治。认为这不关我的事。在英国也有同样的事情——所有人都在领取失业救济金,议会的那些老家伙们重复着以前的废话。最好的事情是管好你自己世界的那小小角落,那就是我的意见。”他找到了耳机的插口,把它们戴到耳朵上。

“他们分发食物的时候,把我叫醒,好吗?”他说道,然后就放低了椅子开始打盹。

我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本书,看了起来。那是一位在非洲住了十年的西方记者写的,这本书的头几章十分详尽地讨论了殖民主义的历史;被操纵的部落仇恨、反复无常和变幻莫测的殖民地疆界、政权更替、监禁、或轻或重的侮辱。

但是到了那本书的第三章,对比过去的描述,更着重于对现在的描写。饥荒,疾病,由无知年轻人领导的政变和反政变,而这种领导人拿着把AK-47s冲锋步枪像拿着牧羊棍子一样的——那位作者似乎在说,如果非洲有采访,那么当前的苦难已经使得这样的历史没有意义了。

可怜的人。凄凉的国家。

我放下了那本书,感觉有一股熟悉的愤怒冲上心头,一种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更加挫败的愤怒。我旁边的年轻英国人正轻轻地打着鼾,他的眼镜歪在他英挺的鼻梁上。我对他感到生气吗?我想知道,这是他的错吗?运用我所有的知识,我所有的记忆,我仍无法立即回答出他刚刚提出的问题吗?我怎能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命运更好些而责备他呢?也许我生气,只是因为他对

我的轻率和随意,只是因为他对我的猜想,我,作为一名美国人,甚至是一名美国黑人,也许很自然地分享他对非洲悲观的观点;设想在他的世界,至少存在着进步的,但是对我来说,只是强调我自己的尴尬境地:一个西方人,西方却不是他完整的家;一个非洲人,却是在前往一片充满陌生人的土地。

再次见到姐姐奥玛

奥玛的公寓在第一层,房间不大,但是让人感觉舒适,法式的门,阳光洗刷着房间。公寓里到处都堆着书,一面墙上挂着一些照片,那是奥玛自己拼凑的家人照片。在奥玛的床上,我注意到,一张黑人女人的大海报,她的脸斜对着一朵绽开的花,图片下面印着“我有一个梦想”。

“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,奥玛?”我一边放掉背包一边问道。

奥玛大笑起来。“那是我最大的问题,巴拉克。太多的梦想。一个有梦想的女人总是有问题的。”

我一定是流露出了旅途带来的疲惫,奥玛建议我小睡一下,而她去大学里教课。我躺到了她准备好的帆布床上,听着窗外的虫鸣,睡了起来。当我醒来的时候,已经是黄昏时分了,而奥玛还没回来。透过厨房的窗户,注意到一群黑脸猴子聚集在一棵菩提树下。年老的猴子皱着眉头,警惕地坐在树下,小猴子们在互相缠绕的长树根上奔跑。我在水池里清洗了脸,烧上水,准备泡茶,然后打开通往庭院的门。奔跑的猴子们都一动不动了;它们的眼睛一致看着我,不远处,响起翅膀的拍打声,我看见一只绿色翅膀的长颈鸟梦幻般地飞上天空,它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声,朝着远方飞去。

老白党胡同拆迁过程中发生一起命案

现实社会

拆迁命案

老白党胡同拆迁。

三月,零星星星地有拆迁户搬出来。四月,大批拆迁户往外搬,来自河南、安徽的破烂王们往里挤,推着小车收破烂。中旬,拆迁公司开来,洪流滚滚铺天盖地。拆迁公司围而不打,勘测、竖围墙和贴标语,很大型很现代的设备把胡同周边的道路排满。四月末到五月初,突然间发起突击性大动作,大型现代设备加爆破,拆迁快得像地震。

动物们的反应如同地震。

大量老鼠拖儿带女投靠无门,引来大量流浪猫。被遗弃的猫仍有领土意识,与流浪猫吱吱哇哇地争夺生态资源。蟑螂们没了藏身之处,光天化日下在残墙高处集结了红彤彤的一层,似乎要练习飞翔,去开辟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宠物狗失宠,只有三分之一被带走,另外三分之二消失了。与此同时,胡同周边烤肉串的排档发生了气味上的变化,牛羊膻之中夹杂了狗肉腥。余下的三分之一固守田园,白天到垃圾堆中寻食,夜晚回到自家废墟吠夜。丧家犬吠夜十分悲凉,饿饿,似乎它们从未吃过。

该工程为北京市拆迁史上最大工程,拆迁方为海查干拆迁公司,隶属于新建集团,各媒体纷纷炒作。本埠有三家平面媒体,按实力排序分别为《雪城日报》、《塞外信息》、《滨江午报》。前两者在重要版面做了消息,而午报只字未见。不是他们丢新闻或是不想做,而是拆迁方不许他们做,他们把人得罪了。

午报在老白党胡同周边有三个报亭。三个报亭均处于可拆迁不可拆迁,可立即拆迁亦可拆迁的位置,按常规,应由拆迁公司和午报协商解决。但海查

干人采取了单边行动,一夜之间将三个报亭毁掉,而且手段极其野蛮。他们用叉车叉起报亭,送到铁路专运线卸货的水泥平台上,然后用压道机碾轧,碾轧后直接装上火车卖废铁。与此同时,午报设立在老白党胡同的阅报栏和宣传广告牌也被推倒。

程启前表现出极大的克制,而其他总编和编委们忍无可忍。编委会上,大家提出:在社会新闻版找海查干人的麻烦!午报可以蔑视,但不能无视!程启前不好以寡搏众,但他把编委们的决议扭了扭。鉴于要闻部与海查干人成见很深,又鉴于他们资质一般,不让他们再去老白党胡同碰钉子了,把黎志坚借调出来跑城建。

黎志坚,社会新闻部首席记者。此前黎志坚在文教卫生部,在医疗战线跑稿。几年间,他连续发表了近百篇批评稿,因此和省市卫生局、各大医院的关系有些紧张。然而,他在读者那里有了名气,被称为铁肩,铁肩担道义的意思。到社会部之后,他做的第一个选题是为农民工讨薪,由于力度大,被农民工们称为老赖克星。受命后在拆迁区域泡了半个月,他摸到了海查干人野蛮拆迁的两条线索。

一、发生过强迁,强迁中有人丧命。拆迁命案中死亡的拆迁户叫余建设,四十一岁,老白党胡同一家黑白铁作坊的老板。余建设的老婆比他小十几岁,叫贺小贺。他们的女儿叫萌萌,三岁半。此外还有一只小狗,叫芽芽。

拆迁动员时,拆迁办和余建设等三十户拆迁户产生了意见分歧。余建设家有五十平米平房和四百平米院落,院落中有六十平米厂房,四十平米库房。按目前的拆迁补偿政策,余建设会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拆迁补偿。然而,拆迁办核准拆迁补偿标准时,依照的是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城区平面图。平面图显示,余建设四百平米院落中的二百平米是垃圾场,厂房和库房都在这二百平米之内。垃圾场是公地,拆迁户无权享受土地及建筑的拆迁补偿。

九十年代是垃圾场?五十年代还是沼泽地哩!余建设不服,咬破手指,在公告上打了一个血淋淋的“×”,然后租了一处房子把老婆孩子打发走,一个人坚守老宅。他把满满一编织袋炸药塞进床下,然后放出口风:随时准备和老宅同归于尽。然而强迁之前发生了一次爆炸,房子炸塌了,他被一堵墙压在地面上,像夹在汉堡中的鸡块。

二、利用拆迁空房,私宰生猪肉。上世纪初,老白党胡同是俄国人的定居点,坡上住中国人,坡上由七、八级石阶相通,坡上的一带被称为七十二蹬。倚坡而建的一带平房中,海查干人偷偷经营起一家生猪肉市场。七十二蹬小区的居民饱受其苦。首先是噪音:猪叫,养猪肉与肉贩讨价还价,二者都有很高的分贝。噪声发生在半夜至天亮前,城市居民酣睡的黄金时段。其次是空气污染,主要是农用三轮车尾气,还有猪粪猪血猪内脏的味道。然后是垃圾,菜市场本身就是一座垃圾场,垃圾堆高起来之后,垃圾堆下又成了露天公厕。

一只纸飞机飞到黎志坚面前

周一下午,老白党胡同同期房开盘,新建集团召开记者会,照例又没有邀请午报。黎志坚死皮赖脸地出席了,其目的是在海查干人面前公开亮相,告诉他们午报报铁肩来了!在会上转了转,又钻进老白党胡同。

余家老宅门前的巷子叫做烘炉巷,海查干一个分公司的驻

地与余家老宅隔巷相望。黎志坚提出要见一见分公司负责人。一个海查干人说进去吧,负责人在客厅。他问:你们负责人怎样称呼?海查干人说姓忠,叫忠贞。忠贞,他想,应该是一位女性。

刚刚从户外进来,眼睛有些不管用,他只能看到不大的客厅里有一架宽阔的大班台,大班台后面是一只厚重的沙发,沙发上窝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。想必忠贞经理一袭黑衣。大班台对面立着一架折椅,吹掉折椅上的尘土坐下,打开采访手册,他说,来采访,同时也是来交朋友。对方没有回答。视力恢复了一些之后他发现,黑乎乎的东西不是经理,而是一只硕大无朋的藏獒!

他面如死灰,藏獒面无表情。

刚才把他骗进小二楼的那名海查干人走过来。要弄记者令他十分得意:怎么不走?哦,等着拿误餐费。然后他自我介绍,他叫梁洪涛,拆迁公司副经理。

黎志坚说:藏獒的副手。

梁洪涛说:找猪吗?

黎志坚说:也找你。

梁洪涛一笑,不找负责人了?然后他打开厂房和库房门。厂房和库房之间的间隔被打通了,偌大的空间里架起了南北大铺,近百名海查干人挤在铺上睡觉。他说:你看他们谁像猪,谁像猪就宰谁!然后他把员工们裹起来,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临时任务:抓虱子,半小时内凑足一盆。员工们很害怕梁洪涛,顺从地坐起来抓虱子,抓不到虱子也装模作样。梁洪涛对黎志坚说:带回去炒炒吃,海查干虱子好,绿色纯天然,你们午报给海查干虱子做过广告,忘了?

黎志坚说:自产自销吧,我不爱吃肉。

梁洪涛说:那个老赖克星好像是你。



刘国民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伸冤的东北烈女,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业的双重厚幕。本书中,这个不死的东北女人让我们揪心,这场动魄的城市拆迁给我们惊悚,这些坚韧的高楼基石使我们深思,这杆孤独的新闻枪管让我们汗颜。

《首席记者》原发于《当代》,刊登后读者反响强烈。因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地产界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原罪,和新闻界少数人在市场化变革中的沉沦,以及中国百姓在国家富强道路上的牺牲,而荣获《当代》拉力赛2008年度总冠军。

